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

——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陈 坚

(山东大学 哲学系,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

关键词:《商君书》;重农主义;精神重农主义;农禅并重

中图分类号:B2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2-0099-06

一

在西方经济学史上,"重农主义"(physiocracy)是18世纪后半叶在法国流行的一种经济学说,其创始人是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重农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是:农业是一国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在社会各部门中,唯一能创造财富的部门就是农业。据谈敏先生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书中的研究,十八世纪的法国重农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在重视农业一点上,十分相似,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国的重农主义受到了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是法国重农主义的思想渊源[1]273-306。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可表述为"崇本抑末"或"上农除末",这里的"本"是指农业,"末"是指商业,所谓"崇本抑末",顾名思义就是崇尚农业而抑制商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的这种"崇本抑末"思想与法国反对"重商主义"的"重农主义"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学界以往对法国"重农主义"、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展开的。如果说法国的重农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经济重农主义"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我们不妨也随缘称之为"重农主义"——则并非只是一种"经济重农主义",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谈"重农"或"崇本抑末",而且,更为复杂的是,在中国古代,倾向于"重农"的还不仅仅只是在世俗领域,一些非世俗的部门也如此,比如佛教僧团之提倡"农禅并重"。总之,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虽然不象法国的"重农主义"那样是一个有组织的学术体系,不但有"经济重农主义"的成份,而且还有"精神重农主义"的成份,这"精神重农主义"是法国的"重农主义"思想所不曾涉及的。

收稿日期:2007-12-23

作者简介:陈 坚(1966—),男,浙江临海人,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佛学和中国哲学.

二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作之一,"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旧题'商鞅撰',但其中有商鞅以后的别位法家作品,可以说它是商鞅与别位法家的遗著汇编。"[2]《商君书》中的重农思想表现为两个向度,一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重农即"经济重农主义",一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重农即"精神重农主义",其中的"经济重农主义"无非是讲重农则"垦草"而"实仓"(《商君书·算地》,以下只注篇名),重农"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农战》),总之,"民泽毕农则国富"(《靳令》),这是人们一般印象中的中国古代重农思想,而且与法国的"重农主义"理路颇有些类似,这里恕不作详细分析。《商君书》中真正令人感兴趣的重农思想乃是它的"精神重农主义",其文证比如:

>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农战》)

又:

> ……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算地》)

如果说"经济重农主义"所关注的"农"是指农业,那么"精神重农主义"所关注的"农"则就是农民。在《商君书》看来,"民归心于农"则"朴"或民"属于农则朴",也就是说,专心务农的农民具有"朴"的心理特征或精神风貌,而"朴"者"可正"(可以引上正道)、"易使"(易于遣使)、"信可以守战"(诚信而可以使之守和战)、"畏令"(畏惧在上之命令)、"生劳而易力"(爱劳动而不吝惜力气)。很显然,如果一国之民皆能"农而朴",那么治国就易如反掌了,国家就可"垂裳而治"了,就可以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了,正因如此,所以《商君书》将"令民归心于农"看作是"圣人治国之要",即所谓的"神农教耕而王天下"(《算地》)。可见,《商君书》的"精神重农主义"是看到了农民"朴"的心理特征,其逻辑思路是:因为"民归心于农而朴","朴"则国易治,所以要"重农"。在《商君书》中,"经济重农主义"为治国提供"国富"的经济基础,而"精神重农主义"则为治国提供"民朴"的心理基础。重农既可使"国富"又可使"民朴","国富"而"民朴",国焉有不治之理?可见,对于治国安邦来说,重农实在是"一箭双雕"之国策——这就是《商君书》之重农思想之全貌。

当然,《商君书》重农思想的这两个向度,并非是同等重要的并列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精神重农主义"上来。对于"精神重农主义"的核心概念"民朴",《商君书》同时还有另一个称谓,叫"民愚","民愚,则知可以胜之"(《算地》),为什么呢?因为务农而"愚","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垦令》),愈"疾农"(积极务农)则又愈"愚",于是乎,"农"而"愚","愚"而"农",在这个"农—愚"的循环中,自然是"愚而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垦令》),从而国胜民而治。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愚"并不是愚昧的意思,而是朴实憨厚之意,与"朴"实际上是同义的。在《商君书》看来,"民朴"或"民愚"的反面就是"民淫"。从事农民这个职业能使"民朴",那么从事什么职业能使"民淫"呢?《商君书》几乎一刀切地认为,一个国家只需要三种职业就够了,哪三种职业呢?一是官,二是兵,三是农,此三者之外的一切职业皆是国家之"虱",皆属寄生而足以使"民淫"。具体地说,属于"虱"而能使"民淫"的职业有五大类,一是"事诗书谈说之士"(知识分子读书人),二是"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三是"勇士"(习武弄拳者),四是"技艺之士"(艺人工匠之类),五是"商贾之士"(商人),"此五民加于国用,……则世巧而民淫"(《算地》),"民淫"而"奸","奸民无朴"(《垦令》),因此,若"农弛奸胜,则国必削。"(《勒令》)有鉴于此,《商君书》提出了"民壹"即"民壹于农"的思想,主张国民中除了少数为官为兵者以外,其他的皆要"壹于农",一律都以农为业,不得以"虱"为业即从事务农以外的工作,从而使"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这样就"淫民止而奸无萌"(《壹言》),治国就

容易了，“是以明君修正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农战》），是以“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农战》），是以“圣人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壹言》）。总之，“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壹农……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壹言》）《商君书》认为，“民壹”则“民抟”，即人民的力量都聚拢了起来；人民的力量都聚拢了起来，那国家就强大了，所以，大“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农战》）可见，《商君书》对“民壹”之于治国的巨大作用是充满了信心的。

虽然《商君书》提倡“民壹于农”有“经济重农主义”方面的考虑，比如它说：“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壹言》），但其提倡“民壹于农”的根本意图并不在“经济重农主义”的“国富”而在“精神重农主义”的“民朴”，这一意图从下面这句话中可以分明看出：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奸不生。（《农战》）

在《商君书》看来，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要以“农”为重，“不偷于农”，因为“农”能使民“朴”而不“奸”，这“朴”而不“奸”的民心乃是治国安邦最牢靠的精神基础，所以“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靳令》）若民“奸”而不“朴”，那圣君就无法行仁义于天下了。可见，《商君书》的重农思想是以“精神重农主义”为主而以“经济重农主义”为辅，亦即其思想核心是“精神重农主义”，“经济重农主义”只是“精神重农主义”的一个自然延伸或副产品而已；或者说，《商君书》之重农主要是着眼于“民朴”，至于“国富”，只要“民壹于农”，“朴而农，农而朴”，全国人民都老老实实地务农，按当时的经济态势，仓廪还能不实？国还能不富？因此，只要“民朴”，“国富”那是水到渠成的事，关键是“民朴”。按《商君书》的观点，民若不“朴”，国再“富”也难以统治——这就使《商君书》的重农思想带上了浓郁的政治学和管理学（统治术）的色彩，与纯粹属于经济学的法国“重农主义”已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商君书》的重农思想和法国的“重农主义”还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其一是在内容上，法国重农主义纯粹是“经济重农主义”，而《商君书》的重农思想则是“精神重农主义”而辅之以“经济重农主义”；其二，法国重农主义以“重农”反对“重商”，其意思只是说国家的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并没有说要废除商业，但《商君书》的重农思想则是要废除包括商业在内的“五虱”之业，其之所谓“重农”实则是清一色的“纯农”。《商君书》之所以要“纯农”，归根到底还是出于“精神重农主义”而非“经济重农主义”的考虑，这就是农民“朴愚”易治而商贾等“五虱”之民“淫奸”难治。不过《商君书》之“精神重农主义”似乎还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愚民政策，因为它只是依据农民的实际心理（即“朴”）来言说其重农思想，并没有设计某种思想来左右和愚弄农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君书》的“精神重农主义”还有几分重视实际的唯物主义气息。

中国古代有着与广泛而深入的重农实践相呼应的重农思想，这些重农思想一般来说都属于“经济重农主义”的范畴，但《商君书》却是个例外，它将“经济重农主义”置于“精神重农主义”之下，有意突出“精神重农主义”，因此，可以说，《商君书》乃是中国古代“精神重农主义”最重要的经典文本。当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精神重农主义”思想的文本也并非只有《商君书》，只是其他文本对“精神重农主义”的论述比较零星和轻描淡写，没有《商君书》那么重视和详细，“如《国语》中记载虢文公谏周宣王未行‘籍田’礼仪的一番议论，实为当时重视农业的代表理论。他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1]286在这里，虢文公对周宣王谈到了“农”对于“上帝之粢盛”（宗教祭祀）、“民之蕃庶”（人口增长）、“事之供给”（日用消费）、“和协辑睦”（社会和谐）、

“财用蕃殖”(经济发展)和“敦庞纯固”(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其中的“和协辑睦”无疑是农民“朴”之心理的社会化,这显然是出于“精神重农主义”的考量。

三

中国古代世俗界的重农思想也波及到了佛教僧团,致使佛教提出了“农禅并重”之思想。《百丈清规》将“农禅并重”之“重农”作为佛门的一项规式定了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普请”制,其制如下:

> 普请之法,盖上下均力也。凡安众处,有必合资众力而办者,库司先禀住持,次令行者传语首座维那,分付堂司行者,报众挂普请牌,仍用小片纸书贴牌上,云:(某时某处)或闻木鱼,或闻鼓声,各持绊膊搭左臂上,趁普请处宣力,除守寮、直堂、老病外,并宜齐赴,当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诫。[3]

所谓“普请”,“普”者,普遍、全部之意;“请”者,恭请,这是佛门表示尊敬的一个常用词,比如到佛寺去购买或索要佛经,不能说“买”或“拿”,而要说“请某某佛经”。让全寺的人(值班或老病之人除外)都去农作劳动,为表示尊敬,故曰“普请”。“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普请”制从其表面来说,或者就其初衷而言,乃是为了解决佛教僧团内部的吃饭问题,即希望和尚们都能靠自己的农作劳动而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是对佛教有关的制度一次大的突破。因为戒律上规定:比丘不得掘地种植,是要托钵化饭吃。但是托钵化饭在中国行不通。……怎么办?我们有一双手,自力更生,自食其力。”[4]53这种“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普请”制是中国和尚的吃饭从印度佛教的“乞讨”制到中国佛教现已定型了的“供养”制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农”的“普请”制乃属于“经济重农主义”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经济重农主义”的“普请”制后来却渐渐地演变成了“精神重农主度”的“普清”制,即“普请”农作已不是为了解决和尚的吃饭问题(和尚的吃饭已由十方供养来解决),而是被作为象坐禅、念经一样的每日功课,藉以训练和尚的佛教精神和人格,此时的“普请”也常被称为“出坡”,因为“当时禅宗的寺院是在山间,每天是到山上耕作,所以叫作‘出坡’;每一个人都应该出坡,上从一寺之主的方丈和尚,下及所有的常住大众乃至少弥、行者,全体出动,都得工作,没有例外,故称为‘普请’。白天在工作之中,也就是在过着自利利他的修行生活,……同时培养互相支援、彼此合作,大家付出,共同分享的和合精神,以维持道场,住持三宝,正法住世,佛日增辉,所以需要劳务的工作,来作为禅修的生活。”[5]可见,“出坡”农作在禅宗丛林中已是“禅翁之意不在食而在佛”了,已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了。台湾法鼓山农禅寺——这个寺的寺名本身就意味着“农禅并重”——方丈圣严法师就曾将“出坡”与佛教的其他修行方法等量齐观,他说:

> 禅堂中打坐、经行、拜佛、课诵是修行,斋堂用餐、饮水、寝室睡觉、起床、饭后出坡劳作等,每一处每一时,都是修行的地方和修行的时间。……出坡时,你的手在哪里,身在哪里,心也就在哪里,……尽心尽力,全心全力,把事情做得妥妥贴贴、干净利落,便是修行。[6]

在另一个地方,圣严法师还曾风趣地说,作为佛教修行的“出坡”农作,应该是陶渊明《归田园居》中的“种豆南山下”,而不是李绅《悯农诗》中的“锄禾日当午”[7],这个比喻无疑是十分贴切和传神的,因为“种豆南山下”折射出来的是精神的境界,而“锄禾日当午”折射出来的则是谋生的尴尬。从原本以解决僧众谋生问题为目的的“普请”到以培养僧众佛教人格为目的“出坡”,中国佛教的“普请”制完成了从“经济重农主义”到“精神重农主义”的转变,从此,“出坡”农作就不再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一种佛教修行或佛门功课。如果说,在“经济重农主义”的“普请”制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思是指一日不农作,一日就没有食物来源,一日就得饿肚子,那么,在“精神重农主义”的“普请”制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就不妨解释为一日不农作,一日就没有完成佛门功

课，一日就不能吃饭。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和尚通过“出坡”农作这一佛门功课究竟能培养起什么样的佛教品格呢？佛教界见仁见智，着眼点不同，对“出坡”农作就有不同的佛教精神诉求，比如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认为，虽然当代的中国佛教寺院有着健全的供养制度，出家人衣食无忧，根本不必“出坡”农作而“为稻粱谋”，但佛教僧团还是要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制度，他说：

> 我屡次提到，僧团的道风要传统化，僧团的管理要律制化，僧团的弘法要大众化，僧团的生活要平民化。平民化，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就是从农禅并重着手，就是要过一种古代丛林的农禅并重的生活。我们每一个出家人，每一个年轻的出家人，一定要知道稻子是什么，麦子是什么，萝卜是什么，白菜是什么，这些东西从哪里长出来，这些东西怎么样从生的弄成熟的。[4]53-54

作为佛门功课，“出坡”农作在禅宗中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了，有人甚至还认为，所谓禅宗，实际上就是以惠能为代表的“南方一帮农民弄出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8]。我们都知道，禅宗主张日常生活中“担水劈柴是道”的“无相”修行，反对传统佛教诸如念经、坐禅之类的“有相”修行，因此，如果说，在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中，“出坡”农作还只是与念经、坐禅等并列的诸多佛门功课中的一种，那么，在禅宗中，“出坡”农作及其类似的“担水劈柴”、“扫地做饭”等日常劳动就是唯一的佛门功课。在禅宗的这种修行观念中，“出坡”农作之作为有着浓厚的佛教史积淀的佛门功课自然就被特别看重。因为，据对“出坡”农作所作的“精神重农主义”的历史解释，“我国自唐朝开始即有出坡佛事，百丈禅师创立丛林制度，奠定道场规矩，更将破柴挑水、日常劳动融入佛法当中，直至八十几岁，仍秉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理念，带领大家出坡作务”[9]，此一传统绵延流传并载之在册，以至于我们今天都还能在禅宗的灯录中经常读到“出坡”农作场景中的禅门“公案”故事，如：

> 邓州香严智闲禅师，…… 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遽归沐浴焚香，遥礼沩山。[11]

尽管我们还不能充分解读这些充满禅门生活情趣的“公案”故事，但是这些故事之发生于“出坡”农作的过程则是清晰可辨的。禅师们在“出坡”农作的当下接引学人，互斗机锋，甚至省发开悟，在他们的眼中，“出坡”农作本身便是天机活泼的禅修活动，而下面这则“公案”更是透露出了“出坡”农作与佛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如：

> 因普请锄地次。有僧闻鼓声，举起锄头，大笑而去。师（指百丈怀海禅师）云：“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12]

在这里，百丈怀海禅师将“普请锄地”的“出坡”劳作看作是“观音入理之门”而非一般的锄地干农活。禅学专家高令印先生在评论这段“公案”时说：“这就把佛性或成佛看成是劳作、吃饭等日常琐事，否定以‘真心’、‘清净心’为佛性或成佛的观点。这是禅学的一大转型。”[13]所谓“转型”，意指禅宗的成佛观由传统的“禅修成佛”走向了“劳作成佛”，“出坡”劳作本身就是一项禅修活动。

如果说，在“经济重农主义”的“普请”制中，“农禅并重”中的“农”与“禅”还是两件事，其中“农”是经济活动，“禅”是修行活动，那么，在“精神重农主义”的“普请”制中，“农”与“禅”则合而为一了，“农”即“禅”，“禅”即“农”，“农”或“出坡”农作完全就是一种修行活动。

四

《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和中国佛教“普请制”中的“精神重农主义”所强调的“精神”是不同的，但它们所考虑的显然都是农民的心理特征或一个人通过农作劳动可以养成什么样的精神品质。那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究竟有什么样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风貌呢？综观社会各个阶

层各种职业的人,无论古今,不管中外,可以说农民是最具优良品德的群体,他们朴实憨厚,随和谦卑;心地善良,性格温顺;为人诚实,不弄虚作假;做事认真,能吃苦耐劳。心地善良乃是农民最本质的心理特征,他们身上的其他一切优良品德皆源于此;或者更简洁地说,农民乃是"善"的象征,甚至是"纯善无恶"的象征。不管是《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还是中国佛教"普请制"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它们都是建立在农民"善"的品德之上的。

西方文化虽然也有赞扬农民之善良的,但西方自古至今都没有因此而诞生"精神重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精神重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唯见之于中国,不但古代中国有,而且当代中国也有,比如"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可以从"精神重农主义"的角度来加以解读。

参考文献:

[1] 谈 敏. 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 高 亨.《商君书》注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
[3] 乾隆大藏经(第149册)[O]. 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1:826.
[4] 净 慧. 重走佛祖路[M]. 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虚云印经功德藏,2007.
[5] 圣严法师. 禅钥[M]. 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171-172.
[6] 圣严法师. 禅的体验·禅的开示[M]. 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241.
[7] 圣严法师. 拈花微笑[M]. 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108-109.
[8] 非 禅. 德山狂犬禅[J]. 灵山海会,2007,(3):36.
[9] 净 慧. 禅堂夜话[M]. 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虚云印经功德藏,2007:59.
[10] [唐]慧 然. 临济录[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40-41.
[11] [宋]普 济. 五灯会元[M]. 北京:中华书局,2002:537.
[12] 续藏经(第2编第24册)[O]. 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虚云印经功德藏,2006:409.
[13] 高令印. 中国禅学通史[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16.

On the Spiritual Physiocracy in Shang Yang's Works an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CHEN ji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ysiocracy consists of two parts, one is the economical physiocracy, the other is the spiritual physiocracy which can be seen in Shang yang's works, whose author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easantry instead of the agriculture. In the viewpoint of Shang yang's works, the peasants are ease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because of their spirits of honesty, so the governor of a country should make in whatever conditions his people all over his national territory become peasants except a small number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order to ensure his government. As a comparable thing, this kind of spiritual physiocracy reflected in Shang yang's works is found in the buddhist regulations regarding farming as buddhist practis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4**Key Words**: Shang yang's works; physiocracy; spiritual physiocracy; regarding farming as buddhist practising